



日本中国学述闻

王晓平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日本中国学述闻

王晓平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中国学述闻/王晓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1

ISBN 978 - 7 - 101 - 05902 - 1

I. 日… II. 王… III. 汉学 - 研究 - 日本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326 号

书 名 日本中国学述闻

著 者 王晓平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1/8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902 - 1

定 价 35.00 元

日本中国学的公众视野(序)

据载,在“世界汉学大会 2007”的主题论坛上,俄罗斯汉学家马斯洛夫提出了“民间汉学”的看法。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国外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有趣的汉文化现象,留意那些在西方国家街头流行起来的小册子,留意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打着汉文化烙印的东西。马斯洛夫希望能够改变“汉学家写的关于历史、文化的书才是真正汉学”的观念,他说,“民间汉学”的概念也许不恰当,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简单化的汉学。专业汉学家不能说:“我是伟大的科学家,这不关我的事。”

《中国教育报》上登载的这段话,竟然和我多年对日本中国学的观察结果有不谋而合之处。

我在日本大学任教的前后 10 余年间,除极特殊情况之外,每天必到图书馆“报到”,《读卖新闻》等四种大报必翻,大多数假日也是我在书店里“立读”(站着读书)度过的。目光在字里行间寻找的就是“中国”二字,最吸引我的就是当今的日本学界如何言说中国,他们的言说和中国学界有那些不同。

日本中国学的公众面孔

凡是谈中国的书我都翻。我特别注意除了东方书店、朋友书店、内山书店、中国书店这些专门卖研究中国专著之外,在那些普



通书店,畅销或者长销的都是哪些书,它们怎样影响着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我发现,人们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及时抓住社会关注焦点的书,它们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同时,这些书大都写得论题集中,条理分明,言简意赅,好懂好读,编在各类“文库”或者“新书”当中。那种文笔艰涩浅陋故作高深的、在术语上兜圈子不着边际的,读者肯定是舍不得掏腰包的,而那些纯考据的或论题分散的论文集,本不具备构建体系的条件而大搞体系化的专著,则大都定价高而销量很小。

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中国学当然只是指那些由研究中国的专家撰写的学术著作。日本也的确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主张排除现实政治、传媒等因素的影响,进行独立自主的中国研究。然而,即使这样的研究,在选题、方法、表述乃至出版机会等方面,仍不能完全与“公众”二字分开。要谈影响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的著述,要远远超出这样的范围。

要讨论日本中国学,单从著者的角度讲,从他们与公众的关系讲,也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这些学者,很多人具有较强的公众意识。除了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为各类“新书”撰写字数10万字上下售价在两三千日元的“小本本”以外,还有的利用面向社会的各种讲坛,就社会关心的问题发表讲演,在公民馆的成人大学、居住区小学、自己的母校,讲述相关问题。已故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奥野信太郎,尚健在的石川忠久、兴膳宏等人,都是日本中国学界的权威学者,他们都写过不少面向一般读者的学术散文、随笔等。白川静研究的甲骨文、金文不可不谓生僻,但他为一般读者撰写的《汉字》、《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等书,都受到欢迎。



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写的“小书”,不因其小而轻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只是实实在在把问题讲明白。如果与中国的日本学界作一下比较,那么就可以说日本的中国学已将一脚迈进公众圈,而中国的日本学还眷恋着书斋。

第二,研究日本学和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学者。这些学者当涉及到中日关系的问题时,在听取中国学者意见的同时,往往更加强调日本的独创性和特殊性,并从日本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探讨。比较文化、比较文学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比较文明研究,也更多试图从世界眼光来确立中华文化的位置和中日文化的坐标。有些影响中国研究的理论,也是由这些人提出来的。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文化交流关系,我国的研究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中国文物典籍外传的宝贵资料,而且还能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以上两个方面的作者主要提供给公众的,是一个“学问中国”或称“观念中国”,接受者的主体是“求知族”。例如,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中华思想说”(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的思想),反复被各类学者称引,甚至有些人言中国必道“中华思想”,有些人甚至把它视为中国文化最显要的特征加以批评,也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只有少数有识者对它提出质疑,如华裔作家陈舜臣。再如,铃木修次提出日本文学“脱政治性”论(即认为中国文学是政治性的,而日本文学是疏离政治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既曾用作对“突出政治”文艺观的批评武器,也伴随着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均为“政治至上”文学的曲解。

第三,专业小说、随笔作家、诗人。日本文学自古以来有重写



中国文学经典的传统。现代作家创作了众多涉及中国或以中国人为题材的作品,《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经典不断被重译、重写,融进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改编为各种现代文艺形式;而随笔作家的中国游记、随笔最迅速地反映着日本人审视中国情感的变迁,还有些诗人(包括俳人、歌人和现代诗诗人)将游走丝路、穿越华夏的感受以歌诗记录下来。他们一方面倾听着“中国学”学者的意见,一方面又具有更充分的个人情感因素,更多涉及到对现实中国的看法。他们的笔下也有一个流动的中国,注入各种复杂感情的中国,迅速给各种人群的中国观打上烙印。吉川英治、陈舜臣、司马辽太郎、北方谦三等作家笔下的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平山郁夫、手冢治虫等画家描画的中国和中国人,其影响上至退休的工薪阶层,下至在学的青少年,远远超过了学者翻译的中国原作。

第四,非专业中国文化相关者。由于个人经历、教养、交往等,对中国的某一问题有浓厚兴趣,也撰写各种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或小书。他们可能是公司职员、专业主妇或自由撰稿者。或从事中国古典的翻译改写(如加岛祥造的《加岛祥造以诗来读的汉诗》、新井满的《自由译·老子》、永井辉的《好懂的孟子》),或创作漫画,或对中国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他们的译作或著述,没有学究调,语言活泼,以普通市民的视角发言,更加简明易懂,销量远远大于学术专著,对公众的影响不可小觑。从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到怎样买中国股票,从汉字游戏到汉诗鉴赏,这类作者的著述反映形形色色的观念。21世纪最初几年书店里层出不穷的类似《难缠的中国》之类的书,也多出于这类作者之手。有时,这一类作者的书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反馈,要比慎重的学者们快得多,他们言说中国的



语言,可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时之语,却也可能是当时最喧哗的众声。

以上两个方面的作者提供给公众的,是一个“文艺中国”或称“乐趣中国”,接受者的主体是“消遣族”。通过这个“文艺中国”,日本人靠本民族作家创造的刘邦、项羽、诸葛亮、杨贵妃等形象去想象古代中国,也靠他们创造的毛泽东、鲁迅等形象去想象现代中国。不论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重写,还是描述个人在中国的经历,日本大众的审美趣味总是决定作品面目的核心。

第五,网络媒体工作者。日本现代传媒异常发达,报导迅速,注重时效,焦点集中,随风转舵,对中国的报道,往往看似公道客观、八面玲珑,实际上倾向性寓于其中。特别是电视对突发事件、刺激性事件的画面无数次重放,可以在较长时间为中国形象“定格”,对公众造成巨大精神震撼,有时甚至足以酿造极端性、爆炸临界性氛围;另外,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政客、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出于“卖点”对事实进行过截割剪裁后的刺激性报道,给观众印象极为强烈,尤其是那些娱乐性的辩论节目,出场者的脱口秀,似与公众情绪环环相扣,又在暗中诱导、试图主宰公众情绪。相反,电视中关于中国文化的声情并茂的介绍(如配有优美音乐和画面的唐诗朗咏),又有单纯文字很难达到的感染力。

这第五方面主要提供给公众的,是一个流动的“即时中国”或称“可感中国”,接受者的主体是“信息族”,是进入信息社会的当代最大的群体。在历来有读书人口众多之称的日本,也面临着读书人口减少的忧虑,但媒体受众却是无处不在,信息覆盖到那里,言说中国的声音就响到那里。日本的受众有随波逐流、鱼贯蜂拥的一面(即所谓“雪崩现象”),同时,教育普及和信息多元化的结



果,也带来理智、现实的一面。

以上这五类作者的著述,相互渗透,接受群体也各自交叉。作者们不停地言说着一个邻国的昨天和今天,尽管对她难说知晓,却让人觉得近在眼前。对我们来说,这五类著述,可以在公众中国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每个方面都有值得开掘的话题。

中国学之花,为公众而开。

“小本本”里的“大学问”

我们这里所说的“公众”的主体,早已不是以往一般的印象,在日本高等教育极为普及的今天,他们不是缺乏专业知识的群众,更不是文盲,而是从事各种工作的“社会人”(包括作为“社会人”后备军的大学生和作为“社会人”退场者的老龄化人群)。他们有的可能是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和中国、中国人打交道的“中国相关者”,今天,日中各方面交往日益频繁,在日中国人数逼近 50 万人,这支“中国相关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也有的并非与中国相关,但身边的中国文化、近邻中国每天发生令人惊异的变化,让他们对中国感到兴趣。对于中国学来说,他们是非本专业知识分子。日本各种研究中国学的学者,最多不过千人,而非本专业知识分子的人数,却是它的数十倍。

日本中国学者的公众意识,已经不仅是历来我们所说的“普及”的层面,还包括学者研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公众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自我定位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我们身边,“普及”常常被作为一种名义,意味着降低学术要求,落伍于学术前沿,公众也仅仅作为被“普及”被诱导的对象,所以人们一看到“小本本”,



似乎马上联想到的是“亚学术”,甚至低水准。而学术的公众意识则意味着学者将自己的最新成果与公众沟通,争取公众的参与,并在和公众的对话过程中磨砺和完善个人的研究。对于个人来说,抱怨读者冷落学术可能于事无补,而积极的摸索至少可以多积累些本领,包括用公众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述的本领。

其实,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专业和非专业的相对性也越来越突出,我们谁都需要及时了解本人领域之外的新知,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小本本”。

日本的公众中国学是公众学术的一部分。印数很小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出版需要来自不同方面的出版资助(如文部省、学术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社会团体和企业的学术资助机构、大学研究费),而面对非专业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的书,则只有不求官场、职场、人情场,而去求市场。这除了依赖于作者适合于公众的表述形式以外(如避开繁琐考证和冗长的论述,叙述简洁等),公众长期接受并习惯的编辑方式也起重要作用。各大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库”着眼于保存学术精品,“新书”则着眼于推出学术新作,两者都盯住非本专业知识分子。它们不求轰动效应,只求常印常卖,是读书界的长流水。像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虽然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小本本”却因为平凡社的东洋文库而随时有售。日本人喜欢精巧物件的传统,决定了这类书全作小开本;但为了适应老龄读者群的需要,岩波文库也专门推出大字大开本的岩波新书,是“大本本”,其中也不乏中国学名著。“大本本”也好,“小本本”也好,里面都有“大学问”。

装帧整齐划一的“小本本”和“大本本”,是出版人通过阅读心理分析创造的规范样式。没有规范,读者便形不成习惯;读者形不



成习惯,出版便形不成规模。“文库”和“新书”是学人和出版人用规范来应对需要的结果,而日本中国学者只是充分享受了这种结果,来为发展中国学服务。

对于我们来说,确立中国学的公众视角是十分必要的。由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学术专著中提出的见解,无疑是我们对话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对后面几种人的著述均有影响。特别是那些对汉学—支那学—中国学各阶段各学派的领军人物,如盐谷温、内藤湖南、川口久雄、白川静等人,他们在学界声誉高,曾获得各类勋章,著述中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我们与他们的对话,应该在了解对方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有望获得进展。同时,对后面几种人的著述,也不可取无所谓的态度。

为了我们自己的国际中国学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仅就明治维新以后而言,就经历了以经学为中心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这样的几个阶段。尽管许多学者深受西方汉学的影响,在战后学界仍以中国学来称谓这门学问,而不用“汉学”。从根本上说,这种名称的变化,是反映了学术观念和中国观两方面的进步的。今天世界对多民族中国的研究,早已不是相沿已久的“汉学”所能涵盖的,即便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在世界性、现代性的前提下期待着突破。当中国学者要研究“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并通过它来与世界学界对话的时候,以“中国学”相称,可能更有利于这门学问的明天。

鉴于世界观察中国的目光的新变化,搞好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就是首先应该做好的事情了。不应讳言,我们对这门学问的认



识,还有不小的主观性,外边世界变化快,而我们常常还在一些时髦术语、或旧手法、旧面孔里打滚爬不出来。

就日本中国学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我国学者是作了不少有益工作的,例如本田成的《支那经学史论》,便有江侠庵《经学史论》(1944,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孙俚工《中国经学史》两种译本。经过一个时期的中断,70年代以后关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在新的起点上重上大道。不过,系统的译介工程仍迟迟不见启动。

今天,汉学或者说中国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出于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强烈愿望,但是,为什么在许多场合,实际上却是自说自话、对而无话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要与某人对话,却对某人的话语、习惯、想法很少了解,那么这种对话也很难进行到底。同样,如果我们与对话对象还是陌路人,对于对象国的文化缺乏足够的知识准备,那么也就很难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很难从对话中吸取什么。

我们的对话者,无疑也希望从我们的谈话中多多获取,因而不使他们失望,也是对话能够继续的条件。在国外经常听到一种抱怨,为什么有些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对自己国家的古老文化,表现出淡漠,知道得那么少?这样的疑问出自日本学者之口,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研究日本中国学,既为知人,亦为审己,而在研究日本中国学的时候,审己和知人常常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对话的最快方式,最好是“无翻译交流”,即双方或多方对话者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进行。无疑,对于中国学来说,首选的语言应该是汉语。然而真正对起话来,这常常不够用。国外学者是用自



己的语言来表述中国的,这种语言的转换有时已经带来了思考方式的转换,为了理解对方,我们还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对话武器。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中国学文萃”正是希望为这种对话搭桥铺路。在国内还很难买到日本学术书籍的情况下,选择一批中国学著作翻译出版,就是当务之急;然而,当学术研究的短期行为“走红”,而对学者的终生贡献评价“缺位”的时候,这类翻译又常为学人所轻。实际上,要译好学术名著,决不那么简单。它既对专业水准有要求,又对中日文水准有要求,而个人的知识结构又常与所翻译的书有距离,这就不得不勤学多思。参与这套丛书翻译的在日学者,自然纯属个人奉献,国内学者,又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不能不忙里偷“闲”,而在许多大学这还是“白干”,因为不被计入科研成果。作为主编,我深知其中甘苦,同时也对翻译质量有更高的期待。强化学术著述翻译的批评研究,是随之而来的课题。

从2005年以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学术丛书“日本中国学文萃”已经刊行了十余种。著者中既有学界的泰斗,也有我熟悉的著名学者。这些书,和整个日本中国学比起来,自然只不过是揭开一角。除去正在翻译的以外,更多的还是在计划中。两种文化的碰撞或许会结出意想之外的果实,我寄希望于更多同好的支持和参与,愿这套丛书每年不断有值得再印再读的译本加进来,再加进来。

目 录

日本中国学的公众视野(序)	1
---------------	---

中日间的文化记忆和文化钩沉

遣唐使的留“洋”心态	3
风自敦煌	6
空海的绿色传说	11
正仓院与《镜中释灵实集》	16
天神的热闹和寂寞	22
镜子里的自我和他者	26
泰山府君与樱花	31
鹅笼四说	37
本土的妖·域外的怪	42
话说日本“诗经现象”	47

日本的“文艺中国”与日本中国学

日本的“文艺中国”与日本中国学	53
《论语》、川柳与凡俗孔子	67
那三国不是这三国	75
世纪初的一百零八条硬汉	80
小说家读史法	85



《西游记》的接受史	89
说不尽的孙悟空猪八戒	94
俳句泰斗的中国旅情	100

对话东亚的中国学家

国际性和科际整合的交融	109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回顾	
书缘与文缘	120
——小记中西进先生	
川本先生印象记	126
与加藤周一同席记	131
学归大众与孤诣独往	138
追寻中日比较诗学的悬案	143
——忆松浦友久	
“国文学”:城堡之外路宽几许?	150
诗人秋吉久纪夫与中国现代诗歌	157
歪译《论语》和“麻婆豆腐糖浆味”	162
——从口袋《论语》到白领《论语》	

日本中国学和中国日本学

多彩的人学	173
日本人的自画像	178
“物”的交流与“心”的交流	183
久远的老北京情结	189
被冒牌的文学经典	194



再吟郁曼陀的《东京杂事诗》	200
地名的魅力	206
享受生活	210
大江健三郎“最后的小说”	214
积聚与日本为邻的智慧	218

中国经典在日本的传播与译介

加岛祥造同老子度日	223
天马行空的《老子》“自由译”	230
从《诗经》到《国调周诗》	236
学人的《诗经》 诗人的《诗经》	243
——海音寺潮五郎《诗经》日文全译	
青木正儿译注的《元人杂剧》	254

日本中国学的周边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断想	263
中日文学关系小史	277
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	298

亚洲汉文学与日本中国学

亚洲汉文学不再沉睡	317
域外“异系千字文”举隅	321
一则从古埃及走到朝鲜半岛的掌故	331
《大唐西域记》之于东亚佛教文学	336
诗人与鬼神的联欢	343



“双足”之学如常青之树	352
——评陈生保《森鸥外的汉诗》兼论鸥外汉诗	
20 世纪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宗失物	366

日本中国学的空间:出版和媒体

日本的文库本王国	373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378
日本太太的澡盆读书乐	382
日本“手机”文字万花筒	386
真假石器与现场主义	389
歌碑·柳坛·连歌会	393

直面公众话中国

汉字让生活更艺术	401
文化能对中日关系有何作为	408
——加藤周一、王晓平讲演录	
中国古诗中的日本人	434

附 录

参考书目	453
初载一览	476

后 记	482
-----------	-----